

何九盈 著

汉字文化学

第2版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何九盈
著

汉字文化学

第2版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文化学/何九盈著. —2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1917-7

I. ①汉… II. ①何… III. ①汉字—文化学—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521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字文化学(第2版)

何九盈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917-7

2016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反思	1
第二节 三种世界眼光看汉字	11
第三节 文化 文明 文字	23
第四节 汉字 汉字文化 汉字文化学	37
第五节 汉字文化研究史	51
第六节 汉字文化学的理论背景	121
第七节 汉字文化学的方法论	129
第二章 本体论	147
第八节 汉字形体的文化功能	147
第九节 汉字音读的文化功能	193
第三章 关系论	215
第十节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215
第十一节 汉字与精英文化	239

第十二节 汉字与大众文化	271
第十三节 汉字与汉文化传播	312
结 语	325
后 记	330
再版后记	332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再度输入，中国出现了“文化热”、“文化高潮”，也出现了“文化泡沫”这样一些说法。有人还编出《文化歌》，歌曰：

你炒文化，我炒文化，他炒文化，大家都来炒文化。吃完一盒快餐文化，讨论什么是文化。我也知道，你也知道，他也知道，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又都说不知道，终于一齐糊涂了。

（陆昕：《文化的异化和异化的文化》，原载《中华读书报》，后收入作者的《月落集》，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

其实，“文化”这个词自从清末传入我国之后，一直就是使用频率颇高的常用词。20 世纪的中国称得上是一个“文化”中国，无论是打仗，搞运动，还是搞建设，都要涉及“文化”。有“文化宣言”、“文化围剿”、“文化建设”，还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何时忘记过“文化”！公平而言，真正在“文化”上做出一点

像样的成绩的是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炒文化”固然不可，何况“炒”“热”的文化肯定是无法持久的；但革文化的命就更是一种灾难了。

翻开 20 世纪的文化发展史，“炒文化”毕竟不是主流，靠“炒文化”起家的人毕竟不多见。至于所谓“文化泡沫”，这完全是个人价值判断的问题。如果与“泡沫”相对的是“永恒”，则永恒的精品任何时候都只能是少数；如果视“普及”、“应时”之作为“泡沫”，这种“文化泡沫”的出现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以为真正值得认真总结、反思的是长达几十年之久的所谓“文化革命”。这里不是专指那个“史无前例”，而是指 20 世纪的文化走向长期以“破旧”、“横扫”、“打倒”为基调，以高唱革命战歌为主要潮流。具体而言，是指新旧文化之争，中西文化之争，“兴无灭资”的文化之争（或者叫“左翼”、“右翼”的文化之争）。这三大文化论争的核心问题是中西文化之争。所谓“新文化”，以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文化，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都不是本土文化，只有所谓“资产阶级文化”在一段时期之内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那年月，一切不符合大政策、小政策乃至大大小小长官意志的言论行动，都可以装进“资产阶级”这个箩筐中，都可以联到“资产阶级”这根线上。

这三大文化论争的功与过只有用专书的形式才能展开来讨论，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判断的标准也很多，功利标准，政治标准，意识形态标准，还有道德标准。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只是汉字与三大文化论争的关系。

在新旧文化之争中，汉字首当其冲。新文化运动的将领们，很少有人不大骂汉字的。汉字被判定属于旧文化这一边，这当然

不错；而凡旧都要革，这就是偏差。用新文字取代旧文字，也就是取代有数千年历史的汉字，实行汉字革命，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中西文化之争中，方块汉字被判定为不如西方的拼音文字。首先做出这一结论的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几千年以来，中国人自己对汉字饱含敬意，敌意的灌输来自西方。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军人、商人，还有某些学人、文化人，他们说汉字不好，才有后来中国人自己的大骂汉字，生出要革汉字命的过激主张。王漪在《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第四章《中国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之影响》中引用了一些西方言论，现转引如下：

在讨论中文之优劣与意义中，欧洲人几乎一致公认中文之艰深颇碍中国人对其他知识之追求。

李明（盈按，原名为 L. Le Comte）说：“这些繁多的字，是中国人无知的来源。”

盈按：此语出自法国耶稣会士李明（1655—1728年）的《中国近事报道》。大象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了郭强等人的译本。将此语译为：“这数量众多的中国字是中国人民无知的根源所在。”（170页）又，李明与白晋、张诚等人于康熙年间来华传教，1688年2月到达北京。

利玛窦说：“中国人必须致力于精通文字，因此耗尽精力，妨碍了学习其他知识。”

18世纪英国军人 Anson 在其名著 *Anso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中论及中国文字，曾予苛刻的批评说：

“说到中国字，他们（中国人）的固执和荒谬则更令人惊讶，经过这么长的历史，在众多国家中，只有中国仍用那粗糙的符号，他们必须精通一大堆超过人类记忆所能负荷的字，书写起来也需要奇异的功力，没有人能够完全精通它。”

孟德斯鸠却认为中文之难反有功於风俗教化，他说：

“夫支那之所以道民齐俗，不外乎礼如此，而是礼也，其所以深入人心不可复夺者有二，一即以其文字之难也，彼都人士常耗其毕生大半之精力从事夫此，盖惟文字精通，而后有以与乎典籍所传著之意。”

17、18 世纪的西方人指责中国人的文字，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国的某些先进人物也起而附和。大概原因有二：一是汉字不同于西方所有的文字，笔画不表音，形状颇奇特；二是文化心态问题。不论怎么说，经过中西文字比较，我们有了注音字母，又有了拼音方案，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所谓“兴无灭资”之争，也就是“左”、“右”之争，这本是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跟汉字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切事物都被简单地划分为两极的那些年代里，如何对待汉字，也有一个站队的问题。从二三十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左派、革命者是主张汉字改革的，至少要附和这一主张，不反对这一主张。文字改革已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政策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赞同或反对汉字改革，就滑到“资产阶级右派”那一边去了，有的学人就因此而当上了“右派”。当年主张改革的理由，并不全错。现在看起来实在太武断，经不起推敲，也可以说幼稚

得很。如认为汉字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控制、所利用，成了压迫无产者及劳苦大众的工具，它难写、难认，于是革命，要废除。谁不赞成就革谁的命，这也叫“兴无灭资”。

这套理论现在当然不管用了，而整个 20 世纪推行了几十年的文化上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汉字文化领域，其他领域也一样，后果是严重的。

1968 年 9 月 24 日台湾学者殷海光在一封信中谈道：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

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的‘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子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在这样的气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

新人物反旧，旧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荡，意气飞扬，防御是尚，于是形成两极，彼此愈来愈难作理性的交通。一九一一年以后的中国就没有像日本那样的稳定的社会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间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荡，更是不可收拾。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 316—317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盈按：此信收入张斌峰编《殷海光文集》（4），

102—104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殷氏所说的“两极”跟我在上文所说的“两条路线”很接近。把政治上的“两极”、“两条路线”搬到文化、学术领域，造成文人、学人自己窝里斗，把许多精力都浪费在斗斗斗上，哪能“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为什么叫喊了一个世纪的“文化，文化”，而没有一部像样的研究汉字文化的精深之作呢？就因为这个领域曾经是颇为敏感的禁区。连汉字的命都要革掉，还谈什么汉字文化呢！

20世纪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世纪，我曾经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绪论》中说：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密切关系。这种变革的深远意义可能我们现在还认识得不透。从历史上来看，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可与之媲美。仅仅“科学”、“民主”这一对概念的输入，就如同石破天惊，为新世纪的新文化埋下了不朽的奠基石，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从此无可奈何地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性的句号。

这番话谈的是主流，现在看来还是站得住的。跟任何伟大变革一样，都要做出牺牲，付出代价，甚至还会留下后遗症，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上面这番话还没有包括1949年以后的情况。1949年以后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产生了许多有目共睹的失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文化的元气为之大伤。人和人之间比之以往更难做“理性的交流”，“更是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比之以往任何一次运动的后

遗症都要严重，留下了种种非学术性的疙疙瘩瘩，种种非因精深学术问题而纯属意气用事的争吵，这不能不归因于包围我们的、我们又不能不呼吸其间、生存其间的文化生态系统。人一生下来就面对某种现成的文化生态系统，为某种文化所“化”。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态系统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人，有什么样的文化人就会有怎样的文化论争。当然，人也可以“化”文化，反作用于文化，从而改善文化生态系统。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我以为“汉字文化学”的建设，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文化反思，就是用新时期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所面对的文化生态系统，解剖它的过去，正视它的现状。没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汉字文化学”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有幸迎来了20世纪的结尾，20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光明的尾巴。我们得以不存偏见地回观20世纪的文化变迁，从中汲取营养，也要检讨文化上的偏差。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要记取的是，无论是研究汉字文化还是别的什么文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宜保持冷静的客观的立场。另外，文化研究者要用文化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讨论的既然是文化问题，就不要用非文化手段使讨论复杂化。遗憾的是已往的文化广场常有非文化的武化习气，火药味太浓。在汉字必须要革命的年代里，为汉字说好话的人纷纷落马，下场不堪言状。这实在太不正常了。文化学术领域中的“风派”也很坏事，随风倒，一哄而起，容不得不同意见，不敢于坚持己见，这都不利于学术发展。在中国，非常需要建立优良的学术环境，营造一种心平气和、宽容高雅的文化氛围，民主自由的讨论空气。上半世纪汉字问题上的种种失

误，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文化生态系统有太多的不健全，有太多的蛮不讲理的暴力倾向。

其次，自有先民以来，文化、文明都是在继承、交流中发展前进的。新旧之间是继承关系，中西之间是交流关系，这里不存在鸿沟。惟新是尚，与守旧、厌旧一样都是不对的，排外与崇洋媚外也都是不对的。

在遥远的伏羲时代、黄帝时代，文化交流就开始了。部落之间的交流，氏族之间的交流，民族之间的交流，后来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人类任何一种文明都必然包含另一种或多种文明的因素，单一的文明、纯之又纯的文明是不存在的。《老子》说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理想，不可能是事实。如果有这样自我封闭的国家，这个国家必然灭亡。老子主张“无为”，主张“绝学无忧”，根本反对发展文化，还谈什么交流呢！

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一直以西方为主渠道，汉代的西方是指西域，由张骞“凿空”；唐代的西方指印度诸地，所以说唐僧上西天取经；明末清初的泰西指欧洲各国。汉唐时代的中西交流，明末清初的中西交流，基本上都是成功的，中方并无“屈辱”之感，连康熙皇帝也积极刻苦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哩！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汉字）的地位并未因交流而跌落。清末到民国年间的中西交流，国人的文化心态大变，传统文化几至于解体，连汉字的命运也岌岌可危，伤筋动骨一百年。百年之后的今天，东方文化才迎来了复兴的转机。我们现在来讨论汉字文化，就是在转机的条件之下生出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

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和汉唐、明末清初的交流相比，情形之所以不同，既有国际原因、社会原因，也有文化自身的原因。

汉唐都是农业时代的强大帝国，与西方诸国相比，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高屋建瓴之势，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时的文化交流，中方处于主动地位，并未触及本土文化的深层结构，即使影响甚大的佛教文化，也无法与中土的儒家文化抗衡。明末清初的文化交流，规模比较小，基本上是在传教士的范围之内，西方的侵略者也只能在边境地区（如澳门）小打小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清末民国时期，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欧洲的强国已进入工业社会，进入科技时代，建立了自由、民主的伦理秩序；而中国还停滞在农业社会，科技严重落后于西方，从皇帝到军阀都紧抱专制主义，与人民为敌。这时的文化交流，中方完全是被动的，西方文化以炮舰为先导，潮水般涌入中国，冲毁了孔家店，也冲毁了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人主张废除汉字，革汉字的命，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也可以说是一切都要重新试验，还可以说是汉字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缺点。至于外国人看汉字，正如外国人看京戏，很难接受，不足为奇。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以高等民族自居，要用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征服全世界，教训全世界，领导全世界，这就不仅仅是文字层面的问题了。

按通常情况而言，中西文化交流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并不是非要走向冲突不可。拿音韵学为例，从古至今都受益于中西交流。从汉末开始，梵学传入中土，开阔了中国音韵学的视野，反切的广泛使用，四声的发现，等韵学的建立，梵学有启示、推

动之功。现代音韵学的发展，也得西方语音学、音位学之助，国际音标的输入，更是功莫大焉。可是传统音韵学还是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江有诰的著作乃至章太炎、黄侃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不因此就失去了自己的光辉，并不因此就要被扔到茅坑里去。

汉字由于自身结构的独特性，很难直接从西方文字研究中受到启迪，但汉语拼音方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汉字学科的一般理论原则，系统化的构建原则，也是深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学科体系的产物，至于“汉字文化”的提出，同样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汉字是本土的，文化在 culture 这个意义上完全是西方的。以 culture 为思维原点研究汉字，这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第三，古代中国是一个思想一统的宗法家长帝国，与之相应的是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作为文化榜样的圣贤只不过是文化专制的偶像。从孔子诛少正卯到李卓吾冤死狱中，还有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到明清两代文化专制愈演愈烈。孔子首开排斥“异端”之风，孟子打着“正人心，息邪说”的旗号，卫孔子之道，拒杨墨之言。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样破口大骂，实开以口诛笔伐代替学理分析之先河，两千多年以后的“文革大字报”不就是孔孟遗风吗！

五四运动批判了文化专制主义，代之而起的是一元文化观。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我正确，容不得不同意见，可以说这是多数中国文化人的毛病。在汉字问题上，压制不同意见，打击不同意见，就是一元文化观的具体表现。一元文化观或者以权威偶像的是非为是非，或者以经典传统的是非为是非，或者以权

势握有者的是非为是非，不允许选择，不允许创新，不允许奇思异想，对学术发展起阻碍作用，尤其是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更是难乎其难。一元文化观推崇的是“道统”、“文统”、“学统”，是多数派，是一言堂，实际上就是话语霸权主义，对于边缘文化往往起压制作用。汉字文化学的提出不过十年历史，哪来的“统”呢！这门学科至今还只是局限在少数研究者的范围之内，还没有受到广泛的应有的重视，就因为它还没有冲破一元文化观的束缚，它的历史意义和深远意义还需要阐发。

局部和整体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整体上观察 20 世纪的文化特质，我们就会明白，汉字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根子就出在文化上，文化一味“大破大立”，汉字能安然无恙吗？

第二节 三种世界眼光看汉字

用传统眼光看汉字和用世界眼光看汉字，所得结论当然不同。

用传统眼光看汉字，汉字神圣得很，从来就没有成为问题。如果有问题，那也只是规范问题、正字问题、正音问题等等，至于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的古人根本就不讨论或者很少讨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里原本就无问题，讨论什么呢！明末来华传教士金尼阁写了一本《西儒耳目资》，曾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讨论，经金尼阁一解释，“中华之字，同音极多”，若用西之切法，“岂不乱哉！”这场讨论还没有开展起来就悄悄地平息了。1892 年，时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1838—1894 年）在这年十月初六的

日记中也比较过中西文字之异同，他的眼光不是西化的，还是传统的。

希腊字文理较长，而总不外以字母摄音，合音成字；故各国皆 26 字母，惟希腊有 36 字母，而法国只 24 字母，于六书中仅得谐声之义。不知声音之道，年久则变。中国经籍，如“天”、“下”、“华”、“庆”、“明”、“行”等字，六朝前犹近秦汉之音，唐以后则纯用今音。以中国之人读中国之字，而高下轻重疾徐，已各自成音，赖有象形、会意等义相维持，故数千年后犹得于考证古训也。外国文字仅知谐声，以口相传，久而易变。况以华言译西语，以今音译古语，以华字译西书，既无一定之音，又无一定之字，而且方言各异，则安能如华文之六体兼备而四书不乱哉？

（《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第 660 页，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用世界眼光看汉字，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世界在变，眼光也跟着在变，汉字还是那个汉字，而眼光却有不同，汉字的遭遇也就不同，这是颇有意义的。20 世纪有三种世界眼光在看汉字，这就是：西方文明中心论者的世界眼光，东方文明中心论者的世界眼光，文明多极论者的世界眼光。这三种世界眼光的实际影响自不可一概而论，立场、观点都大不相同，却都牵涉到如何评价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地位问题。

由传统眼光转换为世界眼光看汉字，根源于中国社会不能不由传统型转换为现代型，在此转换过程中，汉字碰到了前所未有